

第五章 結論

明代的復古運動主導了整整一代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其中後七子的聲勢更統治文壇達百年之久，然而後七子陣營人數眾多，歷來的研究卻集中在少數人物上，這顯示對後七子的論述仍有許多極待開發的園地。再加上「四庫存目」、「四庫禁燬」、「四庫禁燬補編」、「續修四庫」等文獻資料之出版，上千種的詩文集都值得進一步討論，才能使明代文學的探討更為客觀而正確。

而本論文在這樣的目標下，擇定由後七子集團中的歐大任作為審視這股復古潮流的切入點，企圖讓後七子的研究更加深入。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緒論，第二章由廣東的地理環境、文學發展概況，為歐大任的創作背景作一簡單的論述。第三章掌握大任各階段的交友關係，了解大任與當時文壇人物的互動，所得的 407 人，既可建構其交友圈，更能藉此觀察明代中後期，文人間相互標榜、結社唱和的文學活動。第四章由大任的文學主張及詩文創作，審視大任在創作領域的豐碩成果。第五章為結論。附錄年譜則考述歐大任的生平活動，此部分對於傳記及交遊之句稽描述具有極大關係。

綜合上述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嶺南文學與復古思潮是影響歐大任的文學觀念的兩條線，他在傳統與主流之間，表現出兼容會通的文學特質。

一、地域傳統與復古風氣的影響

明代文學流派的形成與文學社團的普及，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¹。廣東在明代初年，因為孫蕡等人南園詩社的成立，他們藉由詩歌的唱和，上追唐人格調外，詩作亦歌頌出具有個人情懷及地方特色的詩歌，進而產生相同或相似的詩風，不僅開啓了廣東詩歌的創作風氣，更使嶺南詩派成為當時的流派之一。可惜的是，廣東地處偏遠，再加上南園前五子未有具體文學理論之提出²，因此，在明成祖永樂之後，嶺南詩派逐漸式微³。一百多年後，歐大任等人於嘉靖二十四年（1545）再聚南園，承繼嶺南宗唐的傳統，除了對當時的詩壇產生影響，也讓嶺南詩派得以延續，為嶺南的詩歌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此外，歐大任受師友的影響也相當大。黃佐的思想理路大抵是崇尚程朱理學，黃佐強調「自得」與「知本」的務實觀念，作學問當以博文為要。而且黃佐有著積極入世的人生觀，詩作以關懷現實社會為出發點，文字質樸、內容寫實。因此，大任才能創作出〈三河水〉、〈邊兵來〉等，以描述百姓遭受戰爭摧毀、生活困頓為主題的寫實詩篇。

¹ 郭英德〈論明代的文學流派研究〉，《求是學刊》，1996年第4期，頁83。

² 龔顯宗《明洪、建二朝文學理論研究》自序，台北：華正書局，1986年，頁2。

³ 胡金望主編《文化詩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361。

大任在廣東期間，好與友人結社賦詩。詩社成立的宗旨，除了講德論義外，其實亦不乏飲酒唱和的活動，這種詩人享樂的風氣，跟廣東經濟的發展不無關聯。因此，文人間宴集作樂的活動，是生活的娛樂，也是創作的重要場所。讓大任的詩作能有清新明麗的抒情寫景佳作，呈現另一種情韻的詩風。

綜合上述所言，在地域傳統及師友的影響下，大任的詩作基本上具有宗唐風、重寫實、富情韻等特質。余孟麟撰〈秣陵集序〉時，云：「楨伯崛起百粵，而詩業寢閱，蓋兼有其勝，能以粵之詩與吳之詩、中原之詩三分鼎立，斯以豪哉？……夫秣陵重，粵重，而楨伯之詩益重矣。⁴」對大任在嶺南詩歌的傳承及推進，推崇其不可抹去之功。

明代嘉靖、隆慶時期，復古主義思潮佔主流，處於這個潮流的文人們，大多難脫復古之風。而歐大任被王世貞援引為「廣五子」之一，成為明代復古格調派的成員，列入了復古集團的行列裡。正如中國文化大學吳智和教授所說：

明代文人若有企圖在社會、藝文上立有一席之地，就必然加入一個集團之中以立名於當時，並取得認同。

當一位文人將自己視為某集團的成員之時，他就會更關心集團的命運，以及堅定不移地執行他的集團所作出的各種決定。⁵

大任在「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大旗下，走上復古的道路。主張詩文創作當自性情出發，而且重視景物的描寫要隱含政教美刺之旨，務必達到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功能。同時遵從取法乎上的指導原則，強調深厚學養的積累的必要性。既是與後七子對詩歌的創作目的取得相同看法，又結合黃佐所承繼的程朱理學之傳統規範，可見大任在接受主流思潮時，仍保有其地域特質。因此，他的作品能在復古眾家中，仍具代表性。張鳴鳳在〈南翥集序〉云：

後世讀君詩，有不嘆七子既凋者半，而君與數公並軌齊驅，以凌厲一時盛矣。⁶

除了歐大任外，南園後五子的梁有譽、黎民表也是復古集團人物。作為嶺南的著名文人，無論他們積極與否，勢必能推動嶺南一帶的復古風氣，讓嶺南的文風得以在主流思潮的影響下，成為文壇不可忽略的部分，故余曰德在〈北轅集序〉：「梁公實（有譽）、黎惟敬（民表）與楨伯迭起，則快然曰：斯蓋揭日月於吾南者矣。即五先生安能當三先生於今之世哉。⁷」可知，此三人對於嶺南復古

⁴ 余孟麟〈秣陵詩序〉，《歐虞部集》，頁 480。

⁵ 吳智和〈明代蘇州社區鄉土生活史舉隅—以文人集團為例〉，收入東吳大學歷史系主編《方志學與社區鄉土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學生，1998 年，頁 25。

⁶ 張鳴鳳〈南翥集序〉，《歐虞部集》，頁 324。

⁷ 余曰德〈北轅集序〉，《歐虞部集》，頁 334。

思潮之拓展，頗具功勞。

不過，到了萬曆初期，復古派模擬之弊病一一出現，使得王世貞晚年，亦對格調說提出改良，提出「通變」的說法，以擺脫剿陳襲舊的陋習。歐大任似乎也見到這個問題，遂有「詩道在神」的論述。雖然還是建立在格調的基礎上，但已表示大任已呈現出向文學革新邁進的端倪。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廣東因地域的封閉，使用的粵語保留了中古漢語特徵，音調和詞彙與中原明顯不同。而歐大任離開廣東，開始作官、與其他文人往來，勢必要捨棄使用母語。因此，王世貞曾說：「暇日覽近集，真詞場麗，不復操粵音。」⁸大任語音的轉變，成了文學理論之外，受主流的強勢文化所影響的另一觀察角度。

二、歐大任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清人溫汝能在《粵東詩海》云：

蘭汀等均有習氣，五古必師文選，今體必效盛唐，矩度有餘，未極變化。其游覽及贈送諸詩，五先生如出一手。顛倒名字，難以猝辨。⁹

這樣的說法似乎有欠公允。畢竟復古派的興起，是由當時文壇的衰弊促成的。文學流派自身沒有錯，歐大任作為後七子集團的一份子，必然是朝著共同的文學目標邁進。而且在大任的創作裡，其實不乏個人情懷的展現，因此，若全盤否認其詩作價值，則歐大任等人的努力，等於是空白的。

歐大任身為復古派的次要人物，而且未有科第，但他博學好文，創作的數量及質量在明代整個復古隊伍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不僅臧懋循稱其創作類李攀龍等人¹⁰。清人何日愈更云：

有明有「宏（弘）治十才子」、「嘉靖四傑」、「四大家」、「前七子」、「後七子」、「前五子」、「後五子」、「續五子」、「廣五子」、「末五子」、「嘉靖八子」之稱。當以何（景明）、李（夢陽）為最，邊（貢）、歐（大任）、徐（中行）、王（世貞）、李（攀龍）次之，梁（有譽）又次之，餘子又次之。¹¹

歐大任的位置與邊貢、徐中行、王世貞、李攀龍等人同列，顯示出大任在復古陣營中的重要性。

文學史中，較少談及歐大任或南園後五子，但歐大任作為「廣五子」之一，

⁸ 王世貞：〈與歐楨伯〉其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二，頁 5710。

⁹ 溫汝能輯《粵東詩海·例言》，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9。

¹⁰ 臧懋循〈與歐楨伯書〉，《負苞堂文選》卷四，頁 99。

¹¹ 何日愈《退庵詩話》，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204。

又是嶺南的重要詩人，他成了主流思潮與地域文學的中介者，雖有模擬復古之作，但詩歌又不為復古派所拘泥，故錢謙益說道：

自王、李倡七子之社，嶺南則梁公實與焉。已而進楨伯於廣五子，進惟敬於續五子；梁與歐、黎皆出黃才伯之門，讀書纘言，並有原本。雖馳驚五子列，而詞氣溫厚，脫蹶張叫囂之習，識者猶有取焉。¹²

因此，歐大任的研究，不論是文學主張，還是交誼考述，他讓我們站在次要人物的角度來審視當時的文學發展，對於復古派的觀察，乃至於對整個明代中後期文壇的研究，將能有更為全面的了解。而且，若從詩學思想的演變過程來看，歐大任「詩主神」的理論，對後七子追求盛唐氣象的主張上，有相當確切之說明，將復古進一步從形式化引向精神層面，深化了復古的內蘊，足以顯示大任並非復古末流中，只知模擬剽竊的人物。

¹²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台北，明文書局，1992年，頁482。